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1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1.1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的关键场所.....	1
1.1.2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态势不容乐观.....	1
1.1.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亟需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2
1.2 研究意义.....	2
1.2.1 理论意义.....	2
1.2.2 现实意义.....	3
1.3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3
1.3.1 理论基础.....	3
1.3.2 国内外研究综述.....	5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1
1.4.1 研究方法.....	11
1.4.2 数据来源.....	12
1.4.3 技术路线.....	13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14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时空演变.....	15
2.1 地缘政治风险指标体系.....	15
2.2 地缘政治风险测度模型.....	16
2.3 地缘政治风险时间演变.....	17
2.4 地缘政治风险空间演变.....	21
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类型划分.....	24
3.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障碍因子.....	24
3.1.1 障碍度模型.....	24
3.1.2 地缘政治风险障碍因子识别.....	24
3.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类型.....	29
3.2.1 最小方差法.....	29
3.2.2 地缘政治风险类型划分.....	29
4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联系时空演变.....	33
4.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空演变.....	33
4.1.1 时序演变.....	33
4.1.2 空间演变.....	37
4.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时空演变.....	39
4.2.1 时序演变.....	39
4.2.2 空间演变.....	42
4.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联系强度.....	44
4.3.1 投资联系强度模型.....	44
4.3.2 投资联系强度时序演变.....	44
4.3.3 投资联系强度空间演变.....	48

5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投资联系影响	51
5.1	地缘政治风险与投资联系强度重心耦合分析	51
5.1.1	重心耦合测度	51
5.1.2	地缘政治风险重心与投资联系重心耦合特征	52
5.2	投资联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响应	56
5.2.1	响应度模型	56
5.2.2	投资联系对地缘政治风险响应测度	57
5.2.3	投资联系对地缘政治风险响应分析	59
6	结论与讨论	65
6.1	结论	65
6.2	对策建议	66
6.3	展望	67
	参考文献	69
	致 谢	74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75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的关键场所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地缘政治逐渐向欧亚大陆聚合，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欧洲成立欧盟、东南亚地区国家建立东盟，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已步入转变和调整阶段^[1]。作为欧亚大陆上的重要的大国，中国以其自身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及其地缘战略要求，以欧亚大陆为依托提出了“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倡议，发挥我国经济的发展优势，促进国内与国际融合发展，加强对外交流。相较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欢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加入，推动沿线各国建立互利互赢和发展繁荣的区域合作网络。“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 10 年以来，180 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合作文件，开展多方位的互联互通合作^[2]。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仅是中国地缘政治的关键场所，也是决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地缘经济利益的关键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与 BRC 的贸易和投资不断提升。2022 年中国对 BRC 的进出口总额达到 138339 亿元，较前一年上升 19.4%，BRC 对华直接投资，金额 891 亿元，增长 17.2%^[3]。显然，“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已成为中国地缘政治经济的关键场所。

1.1.2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态势不容乐观

“一带一路”建设中收益与风险并存。面对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地缘政治局势愈发扑朔迷离。已有报告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威胁世界安全与和平的首要风险^[4]。此外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是激发了 BRC 对倡议的怀疑和排斥，阻碍了“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一带一路”沿线既包含了中亚、东南亚等地缘政治“破碎地带”，也囊括了南海、中东、东欧等大国博弈焦点地区，还覆盖了阿富汗、叙利亚、缅甸、苏丹等恐怖主义、民族宗教冲突高发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态势严峻。“一带一路”在建设过程中遭受到政府政权不稳定、恐怖主义威胁、民族宗教冲突不断、战争暴力威胁和国家间关系恶化等地缘风险威胁，致使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完全停摆，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巴经济走廊恐怖主义袭击、阿富汗的民族宗教冲突、美国对中缅密松水电站干预等事件的地缘政治风险溢出，更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利影响。

1.1.3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亟需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从国家发展大局推动落实，为中国“走出去”提供了优质的平台和机会，鼓舞中国企业主动在“一带一路”沿线寻求发展的市场和机会，实现了中国更进一步对外开放。自 2013 年后中国与 BRC 投资合作和交流快速增长。至 2020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高达 1329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 2.3 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的对外经济发展^[5]。“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风险较高，投资回报率不足以吸引欧美等发达国家重点关注，即使在沿线进行投资活动，也会尽量避免高风险国家或地区^[6]。然而，中国在对外投资实践中，存在着高地缘政治风险和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印度尼西亚、老挝、塔吉克斯坦、印度和阿尔巴尼亚等高地缘政治风险国家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中占有显著地位，中国企业在这些高风险国家的投资成功比例不低于低地缘政治风险国家，在 2016 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金额已经超过 18 亿美元^[7]。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经济水平有限，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且遭受着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暴力或非暴力的地区冲突、大国的干预或制裁等地缘政治风险威胁，使得中国与其间的投资合作面临着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例如，中尼铁路建设由于受国内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的干扰以及邻国和域外大国的间接干涉至今尚未开建^[8]。而这并不是个案，“一带一路”建设中既面临着东道国长期或突发的障碍，也面临着与大国间潜在的争端，因此，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亟需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构建了基于地理视角的地缘政治风险赋分评估体系，有利于地缘政治风险的量化研究，推进了相关研究发展。当前学界对 BRC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剖析和基于单一风险要素指标的评判，缺乏多维度多要素的地缘政治风险综合评估。本研究从主权风险、军事风险和大国干预 3 个维度构建 BRC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丰富了评估地缘政治风险的指标体系。虽然相关研究对于 BRC 地缘政治风险和投资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是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实证与效益分析，基于地理空间视角下的地缘政治风险与投资的互动关系研究较少，本研究解析中国与 BRC 间投资往来及其投资联系强度的时空格局，探析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重心与投资联系强度重心的耦合态势，刻画了 BRC 地缘政治风险对其与中国投资联系的影响，将进一步充实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研究。

1.2.2 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大力推进,为实现各国互联互通,建设经济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对外发展倡议,是实现中国“走出去”战略重要的实践策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国家间意识形态、组织形式和社会文化等的差异致使国家间的摩擦和矛盾随之加剧,诱发区域地缘政治风险。在投资合作过程中,由地缘政治风险导致合作项目陷入僵局乃至停摆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潜在的威胁迫使沿线投资活动急需重视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影响。预判 BRC 地缘政治风险变动,减轻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与 BRC 投资活动的不利影响,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健康发展极为重要。因此,本研究评估 BRC 的地缘政治风险,解析 BRC 的地缘政治风险的障碍因子和类型,分析中国与 BRC 的投资联系强度,评估 BRC 地缘政治风险对其与中国投资联系的影响,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预判、防控和提升“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安全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

1.3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研究综述

1.3.1 理论基础

1.3.1.1 地缘政治理论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参与的国家 and 地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困境,因而构建相关理论解析地缘政治风险成为重中之重。地缘政治理论基于地理视角研究国际关系,是阐释地缘政治风险、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刻画地缘政治风险成因及其影响的重要理论支撑。当前地缘政治理论最经典的 3 个理论分别为麦金德的“陆权论”^[9]、马汉的“海权论”^[10]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11]。麦金德将全球的政治力量分为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在历史进程中世界政治力量的竞争实际就是陆上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博弈竞争。“一带一路”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参与的国家 and 地区中分别包含了陆上力量的中心和海上力量的中心,一带一路沿线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的竞争和对抗将加剧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马汉的海权论进一步强调了麦金德理论中海上力量博弈的重要性,而海权争端的加剧会导致海上地缘政治风险的爆发。斯皮克曼认为世界力量的中心将长期处于中纬度地区,其中指出的三个世界力量中心中的欧洲沿海地区和欧亚远东沿海地区,以及未来存在潜力的印度,位于欧亚大陆的边缘,是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参与地区和国家。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的多个强权力量中心与地区力量中心的博弈,都将使得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极易溢出。无论是陆权论、海权论还是边缘地带理论,都强调了欧

亚大陆是大国博弈的关键地区，而欧亚大陆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建设场所，在建设过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面临着各种困境，致使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波动不断。

1.3.1.2 流空间理论

“流空间”理论最早来源于 Castells 的著作《信息化城市》一书中，将其定义为“不必地理邻接即可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12]。“流空间”将“流、节点、网络”作为基本要素，流要素包含人流、物质流和资金流等各种社会经济活动要素流，反映空间内各主体之间的生产活动形式以要素流交换的形式，形成社会经济联系^[13]。节点要素是传递流的物质媒介，指空间中的个人、企业、城市和国家等，流要素的汇聚、流转等活动依靠着节点的功能来完成，各网络节点又通过流要素相联系。网络要素是各网络节点由各种流要素连接到一起的复杂系统，既包含了跨越遥远的空间距离实现资源传输的现实网络，又包含将虚拟的流化资源通过现实节点物化为实体形式的虚拟网络^[14]。投资流作为 BRC “流空间”的重要要素流，其流动、交互、转换促使 BRC 形成紧密的投资联系。“流空间”理论认为国家间投资联系是双向的投资交互，双边投资流量的同时增加比单边投资流量增加的更能提升投资联系。因此，评估中国与 BRC 的投资联系不仅要考虑中国对 BRC 的投资流量和 BRC 对中国的投资流量，更要重视中国与 BRC 投资流量的交互。

1.3.1.3 风险防控和预警理论

风险防控和预警理论涉及风险防控和风险预警两个方面。风险防控是指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对已发生或未发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尽可能减少损失和不利影响，控制风险的延伸^[15]。风险防控可以从风险防控主体、风险技术分析、风险内容评估以及风险制度规制 4 个方面着手，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和风险防控的技术水平，评估风险内容多样化，以制度效力有效防范风险^[16]。雷向阳提出，风险防控可以通过完善风险评估、监测等方面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提高风险防控水平^[17]。风险预警是指以风险形成的相关数据为基础，对潜在风险实时监控，根据风险警情的出现前的反馈采取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来抑制其发生概率和可能的破坏程度并收集相应的反馈信息的过程^[18]。风险预警机制通常包含确定警级、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警度评估四个步骤^[19]。“一带一路”沿线既有恐怖主义、民族冲突、跨境武装袭击等地缘政治风险，又有投资依赖、贸易依赖、援助依赖等诱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冲突。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防控和预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意义重大。

1.3.2 国内外研究综述

1.3.2.1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研究

(1) 地缘政治风险内涵

关于地缘政治风险的定义,目前尚未有统一的观点,且相关学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概念界定较少。从经济学视角上,地缘政治风险强调政治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Middeldorp 等人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是破坏性事件风险上升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上升造成的影响^[20]。Balcilar 指出地缘政治风险对股票市场波动产生影响^[21]。Neacsu 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是受国与国之间或地区之间冲突和矛盾、恐怖主义活动等事件影响国家或联盟的经济变动和地缘战略调整^[22]。这些学者均强调了地缘政治风险对国家利益、地缘政治收益的破坏^[23]。从国际关系视角上,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是由地缘关系导致的政治风险。Caldara 等人在其著作《Measuring Geopolitical Risk》中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不确定的战争、恐怖主义以及影响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国家和政治主体之间的紧张局势等地缘政治事件威胁的实现和升级^[24]。Burrows 等人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是日益加深的贸易保护主义、能源危机以及水和粮食的短缺等造成的威胁关联触发国际或区域的政治经济风险变化趋势^[25]。从地理学视角上,地缘政治风险是地缘因素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张晓通等人强调地缘因素,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特定地缘空间的开发、塑造、竞争或控制,造成既有地缘结构与利益结构变化而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18]。肖方昕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对特定地缘空间的开发、塑造、竞争或控制,造成既有地缘结构与利益结构变化而引发的政治风险^[51]。熊琛然等人结合 Bohl 等的观点,指出地缘政治风险是地缘政治主体或事件间的矛盾冲突共同作用于政治、经济和自然三者造成的风险的连续影响的可能^[26]。本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的地缘政治风险内涵和参考相关研究,将地缘政治风险定义为地缘体基于自身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军事实力等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进行合作、竞争、对立、遏制等战略互动,对以主权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

(2) 地缘政治风险成因

造成地缘政治风险产生的因素有很多,当前的研究总体可以分为三类,即资源因素、经济因素和权力因素。资源因素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一方面是能源、水、矿产等传统资源的争夺。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直言石油安全和确定性只在于多样化,因此各国纷纷在世界各地开展合作拥有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能源获取渠道,制定长期战略,确保国家供给^[27-28]。然而,在此过程中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特别是随着全球工业化高度发展导致的全球变暖等气候变化,人民迫切追求可持续绿色能源,世界能源格局和产业格局发生巨变,国际地缘政治风云变化,引发

的地缘政治风险引人注目^[29]。随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成为各国之间,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冲突的矛盾之一,流域之间分水不均、河流上下游国家由于灌溉和发电以及水质问题产生的冲突等,使得国家间将水资源争端上升到政治争议和国际关系问题,致使地缘政治风险爆发^[30-31]。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融,北极的地缘战略地位快速上升,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航海航线的出现,致使各国在北极地区纷纷展开资源竞争和国际合作,北极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陡增,曾经的研究“荒漠”进入人们的视野^[32]。

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和国际经济争端等经济因素易诱发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在国内经济发展问题上,国内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对相关经济实体的干预,影响国家的经济有序发展,诱发国家地缘政治风险^[33]。“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经济处于发展中,自然资源蕴藏丰富,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资源带来的社会冲突远高于其经济价值,国家生产停滞、族群冲突不断、政局动荡不安,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34]。在国际经济争端问题上,金融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格局震荡和大国、国际组织对他国的经济制裁,使得东道国的经济发生一定程度停摆乃至衰退,这些危机诱发东道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攀升^[35]。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大国通过干预后起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及调整国际经贸利益格局等行为,争夺地缘经济利益,维持本国经济地位^[18]。

由权力因素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往往受到大国间的较量、大国及国际组织干预他国事务等影响^[36]。自 20 世纪起始,以美国为首的大国逐渐将地缘战略重心向欧亚大陆转移,位于欧亚大陆西部的欧洲发达国家、东盟、中日韩构成的快速崛起的欧亚大陆东部国家以及位于欧亚大陆两翼的美国和俄罗斯,都将地缘战略重心聚焦于欧亚大陆,并展开一系列战略部署,以图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演变之际占得先机^[37-38]。美国自 2011 年相继提出“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逐步将海外军事部署从中东、海湾等地区向东移动,意图控制亚太地区以维持其超级大国的战略地位^[39]。俄罗斯积极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与欧亚国家合作,巩固远东地区战略空间地位,参与国际地缘政治新格局^[40]。日本一方面巩固美日同盟,加强其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逐步将其经济重心和战略重心向东亚、东南亚地区转移,试图扩大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41]。为实现区域一体化,扩大区域实力和影响力,欧盟、东盟等地区性联合组织越来越普遍,在成员国层面巩固内部联合,在联盟层面强化联合组织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实力和影响力^[41-43]。

(3) 地缘政治风险评估

对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可以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和可视化研究。对地缘政治风险评估的定性研究,从尺度角度可将致险因子分为东道国因子、地区性因子和全球性因子三个层面,对地缘政治风险的管理以建设信息系统作为探雷器,建设保险保障系统作为铁布衫,建设企业合规管理系统作为导航仪^[34];从成因角度

将致险因素分为经济因素、武装冲突、权力竞争和资源环境因素 4 个方面^[26]。当前仅仅定性化评析地缘政治风险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因此近年来定量化评估和可视化分析因其优越性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一些学者通过关注度指数^[44]、政治制度指数^[45]、经济质量指数^[46]和文本数据分析法^[47]等方法进行地缘政治风险评估。Caldara 和 Iacoviello 运用文本数据分析法,构建了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地缘政治威胁指数和地缘政治行为指数,测度 19 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弥补了对实时地缘政治风险指标测度研究的不足^[47]。国内学者杨文珂等人通过适应性预期理论模型测度 2001-2017 年 12 个新兴经济体的预期地缘政治风险。张克钦采用 Caldara 价格指数模型构建的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测度中国地缘政治风险 (GPRC) 和全球地缘政治风险^[48]。此外,运用经典引力模型^[29]、中亚国家政治风险量化分析模型^[49]和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34]等考察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地缘政治风险的量化与可视化密不可分,近年来国内外不少机构推出地缘政治风险制图,经济学人智库借助风险追踪技术,实时监测全球 180 多个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变化,并对地缘政治风险进行等级划分与制图^[45], Marsh 通过 BMI 公司数据每年绘制包括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图,展现了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时空演变过程^[44],为地缘政治风险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目前相关学者和机构对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已经做了较多工作,然而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有:定量分析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多从政府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因素测度地缘政治风险,从主权风险、军事风险和大国干预等风险因素测度风险较少,因此本文从地缘政治风险测度应该主权风险、军事风险和大国干预三个维度测度 BRC 地缘政治风险。

1.3.2.2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研究

地缘政治风险作为地缘政治事件爆发的结果,对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深远。地缘政治风险对政治产生直接影响,随着国际间合作与交往的日益密切,对合作双方国家及周边邻国的政治态势甚至国际政治格局都将产生持续影响。以中非之间的“铁路外交”为例,随着中国与非洲铁路合作的深入,不仅实现了非洲交通状况的向好,也加强了两国的联通程度。然而,随着非洲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潜力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在非洲展开的合作与他国的地缘战略部署出现一定重合,导致区域竞争加剧,引发政治战略主体之间的地缘冲突^[50]。铁路建设作为一个较为庞大的工程,势必成为执政党重要的政绩,致使东道国党派之间争斗不断,打破国家原有稳定的政治局面^[51]。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成为影响国家经济的主要风险之一^[52]。地缘政治风险对于国家或地区的油气资源供给、贸易和投资等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油气资源作为目前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其供给保障是攸关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但油气主要供应国的地缘政治局势复杂、运输不便且易受沿线国家和大国影响等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了油气资源输出安全^[5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力作用于全球贸易流动，国家间的贸易战、关税壁垒和突发的战争等地缘事件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冲击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和国际资本的流动^[54-55]。

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投资主体一般偏向于选择地缘安全更高的地区开展经济活动，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抑制投资活动的开展，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小国和新兴国家影响尤为突出^[56-57]。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重视暴力冲突、军事威胁等地缘政治事件对投资的阻碍，Gallup 曾直言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威胁超越经济^[58]。目前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缘政治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区位、时机等方面。在投资模式选择上，Cao 等人提出当企业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增加时，通过不断加大跨国并购活动，既可以分散企业承受的政治风险，又可以增加企业收入来源的多样性、多元化^[59]。在投资区位上，Buckley 等学者较早发现，中国企业偏好在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这些国家外商投资匮乏，市场广阔，高风险伴随的高收益吸引着中国的投资者^[60]。在投资时机上，Julio 等学者发现企业在选举年的投资比非选举年降低 4.8%，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企业投资^[61]。由于地方官员更替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显著增加当地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和倒闭风险，因此在官员更迭的年份企业投资普遍降低^[62]。同时，由于企业 OFDI 对东道国政治环境的敏感度高于母国，跨国企业可能更倾向于推迟投资^[61]。为此，越来越多的政府和经济实体重视地缘政治风险对政府投资影响，并将地缘政治风险管理正式纳入投资决策^[63-64]。Bloom 等学者指出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不断遭受地缘政治风险的威胁与挑战，因而对外投资态度愈发谨慎，致使项目落地难以如期推行甚至陷入停滞^[44]。各投资主体将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纳入投资风险评估中，必然形成一定的投资风险偏好^[66-67]。

1.3.2.3 “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出的重要外交政策，在与各国实现合作共赢的同时，打破了原有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的地缘政治格局，挑战大国战略利益，引发沿线国家的担忧，因此也必然伴随着地缘政治风险的产生^[68]。作为大国博弈的焦点地区，“一带一路”在推动亚欧大陆资源配置整合过程中，周边大国竞争和制衡反应强烈，局部战乱动荡、发展不稳定、非传统安全因素等困扰着中亚、东南亚、南亚等“破碎地带”的发展，地缘政治风险极其复杂^[34]。受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多数外国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向欧亚大陆发展过快，威胁其他国家在沿线的战略布局和利益。因此破局国外学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完善“一带一路”研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对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进一步对外开放十分重要。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国别研究。从国家来看，“一带一路”以中国为核心，从周边国家和地区向全球不断扩展延伸，其地缘政治风险受到沿线国家、区域以及国际关系影响^[69]。刘海猛等人指出 BRC 政治风险国别分布具有高度集聚性，阿富汗、伊拉克、缅甸、也门、利比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政治风险尤为显著^[70]。阿富汗作为连接中亚和南亚的重要枢纽，2014 年美军撤出后，当地组织及恐怖主义势力乘机活动，阿富汗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接续上升，导致沿线遭受严重的地缘政治风险^[71]。从 2003 年至 2011 年延续九年的伊拉克战争使国家安全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自 2013 年快速崛起的 ISIS 恐怖主义势力，使得伊拉克的地缘安全更加雪上加霜，导致伊拉克的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为“一带一路”建设在伊拉克的开展带来极大挑战^[72]。缅甸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引发域内外政治势力的争夺，加之“大选”后各派系与势力的矛盾激化，致使缅甸地缘政治格局动荡不安，诱发区域地缘政治风险^[73]。一方面沿线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整体地缘政治风险水平，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引发了 BRC 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域外国家受吸引逐步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当中，“一带一路”倡议必然会在国际合作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BRC 地缘政治风险影响着沿线投资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区域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强弱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能源投资、旅游业投资和海外大型项目建设等决策中十分关键。BRC 地缘政治风险受资源、环境和中国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对 BRC 能源投资时，环境约束和地缘政治风险也应考虑在投资决策中。在对 BRC 的能源投资中，沙特、阿联酋、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是中国能源投资平衡资源潜力和投资环境最理想的选择^[74]。中缅密松水电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 BRC 投资合作的一大项目工程，为解决缅甸当地用电荒问题、实现能源转换价值，中缅公司与缅甸相关部门共同合作，推动密松水电站项目，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团体对中缅密松水电站项目频频干预，当地反对组织的活动和缅甸政府的态度转变，最终导致项目搁置，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是导致投资失败的直接原因^[7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对外投资难以回避在国家联系、国际联动日益紧密的投资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在投资合作中如何提高地缘政治风险防范意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阻滞中国企业“走出去”进程^[76]。受东道国国内政治风险外溢和域外大国干预等的影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进程及其收益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77]。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 数据库显示，2005-2018 年中国企业在 BRC 和地区投资受阻或失败的案例共 81 起，造成约 1017.8 亿美元的投资项目资金遭受损失^[78]。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偏好地缘政治风险

较大的欠发达地区，且伴随着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的升高而增长，这些地区多属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国内政治环境脆弱，国家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强权政府，政权更迭常常导致政治局势动荡^[79]。新任政府往往会打压前政府与中国企业签订的项目，使企业蒙受巨额损失^[80]。而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牵涉部分大国的利益，这些国家直接或间接地阻碍沿线节点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从而阻滞“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资金与人员融通。域外大国对“一带一路”的破坏致使地区地缘政治风险急速上升的次生危机。以美国为例，为了限制“一带一路”建设发展，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并开展一系列针对性计划试图代替“一带一路”^[81]。

1.3.2.4 文献评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及其投资影响的研究较为丰富，对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研究成果丰硕，对本研究助力良多，但现有研究并不完善。

第一、地缘政治风险定义尚未统一，地理视角下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定义较少。相关学者对地缘政治风险的内涵基于不同视角主要可划分为三类，从经济学视角上，地缘政治风险强调政治事件带来的经济影响。从国际关系视角上，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是由地缘关系导致的政治风险。从地理学视角上，地缘政治风险是地缘因素引发的国际政治风险。目前现有的地缘政治风险内涵多基于经济视角界定，地理视角下地缘政治风险的构建较少。本研究从地理视角出发，基于梳理地缘政治风险内涵和参考相关研究，提出本研究的地缘政治风险内涵，扩充地缘政治风险内涵。

第二、地缘政治风险成因多样，但对其障碍因子和类型划分的量化研究较少。资源因素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除了对能源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传统资源的争夺，还有对北极航道的争夺。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和国际经济争端等经济因素诱发国家地缘政治风险。由权力因素引发的地缘政治风险，往往是由大国间的较量、大国及国际组织干预他国事务引发的。这些成因研究主要为定性研究，没有对障碍因子完全识别化，也没有划分地缘政治风险类型，研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不够全面客观。因此本研究从主权风险、军事风险和**大国干预** 3个维度构建**BRC** 地缘政治风险指标体系，识别影响**BRC** 的障碍因子，并划分**BRC** 地缘政治风险类型。

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地缘政治风险与投资间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方面，沿线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遭受着不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但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影响中国与**BRC** 的投资尚未厘清。地缘政治风险如何阻碍中国与**BRC** 的投资往来尚未明确。另一方面，地缘政治风险与投资之间耦合的规律尚不清晰。现有研究对地缘政治风险对政治、经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506205101123010201>